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七个坚持”集聚天下英才

陈丽君

2003年12月,浙江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策部署,指引浙江迈入人才和科教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多年来,从“加快建设人才强省”,到“高水平建设人才强省”,再到把人才强省、创新强省作为首位战略,浙江不断深化对人才资源的认识,持续探索从单维人才管理到多主体人才治理的工作体系,实现了从以激励性政策吸引人才,到以全生命周期服务集聚人才,再到以最优人才生态留住人才的转型,通过“七个坚持”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一、坚持党管人才的制度优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管人才是中国特色人才制度的根本优势,浙江通过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不断完善党管人才的体制机制,紧紧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制定出台面向各类人才群体的引才政策,广纳英才。一方面,在全省布局搭建高水平引才育才平台,引导人才向高能级战略平台、开发区(园区)、“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等重点人才平台集聚;鼓励各地积极打造柔性引才渠道,“海鸿计划”、海外工程师项目等应运而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在全球布局海外创新创业中心、国际联合实验室、企业海外研发机构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另一方面,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探索完善党组织聚育才育才新路径。健全“一把手”抓“第一资源”的责任体系,通过设立常态化人才例会、人才专班等方式,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人才工作述职评议;完善跨部门沟通协作机制,打造人才工作“省市县纵向畅通,跨部门横向有效”的治理网络。

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构建立体化多元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浙江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念,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针对科技人才、工匠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乡村振兴人才、重点产业人才等重点人才队伍,持续制定和更新人才培养政策。如针对青年人人才培养,探索建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贯通式培养模式。又如开展职业技能等级“新八级”制度试点工作,不断拓宽高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前景。持之以恒建设完善各类人才培养平台,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建设作用,院士专

家工作站、大师工作室已遍地开花。积极推动人才培养主体和用人主体共同开展人才培育工作,如推动海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与我省企业共建博士后工作站。系统化搭建本土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为例,目前已经构建起“省市县乡”四级乡村振兴人才培育体系。

三、坚持发挥企业家用人主体作用,让市场决定人才资源配置。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民营企业家是浙江的最宝贵资源、最宝贵财富。企业家的人才观极大程度决定了企业引才育才留才的动力和成效。浙江抓住企业家这个“牛鼻子”,高度重视对企业家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科学人才观的塑造,通过专题培训、先进观摩、政策赋能、精准服务等举措,激发企业家求才育才积极性,形成了一大批企业礼遇人才、人才成就企业的创新案例。同时,为提高企业家的企业管理能力,台州等地建立了企业人才工作指导员制度,充分发挥企业与业务部门、企业与人才、人才与业务部门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作用。此外,通过聘任企业家为引才大使、设立企业家“重才爱才伯乐奖”“引才伯乐奖”等举措,进一步激发企业家对人才工作的荣誉感,树立“人才强企”理念。

四、坚持提供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以高效行政效率留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近年来,浙江立足实际,以打造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为切入点,迭代升级人才服务机制,全面解除人才后顾之忧,让广大人才从“流入”变“留下”。一方面,以人才思维解决好人材关键小事,在人才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住房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为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如近年来,杭州通过共有产权房、专项租赁房、货币化补贴等多种手段相互补充,全力解决各类人才住房问题;通过创办学校、人才子女择校等方式解决人才子女的教育问题。随着国际人才增加,浙江加速人才服务“国际化”进程,全方位营造适合国际高端人才创新发展的医疗环境,建设国际学校,保障外籍人才子女入学。另一方面,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政府建设的推进,浙江人才服务进一步聚焦提升行政效率,加快实现人才创新创业事项的“一网通办”,推动人才服务

向数字化、高质量和可定制转型。

五、坚持推进人才工作数字化转型,构建多元共治人才治理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未来的人才流动更多是基于网络或者虚拟技术的智慧、才能的流动,这意味着要建立更为柔性的治理体制机制,提升人才治理的包容度。浙江依托数字化改革,通过创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模式、开发“浙里人才之家”“浙派工匠”等应用场景,全方位提高人才服务的效率和效能,进一步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此外,面对人才更为复杂和多向的流动,要建立起新时代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宏观治理能力。浙江探索构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共治式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党委政府重点抓宏观调控和微观引导,不断完善人才发展“顶层设计”,为人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政策保障;用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需求自主实施人才引进、评价、开发、激励等人才资源配置活动;社会组织以专业化的资源和竞争优势参与人才工作,以市场化手段为人才和用人主体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服务。

六、坚持向用人主体放权给人才松绑,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最大限度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对于人才工作,浙江始终敢于破除人才流动、创新创业的障碍,全面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积极推进用人单位自主评价工作,将人才的认定、评价权限充分下放给用人单位,鼓励第三方人才评价机构、行业协会参与人才评价。在各地推行“专家举荐制”“法人举荐制”等,通过竞聘上岗、民主推荐等方式,打破年龄、学历、资历、身份对人才的限制。建立更加科学的人才激励机制,近年来,浙江不断深化“亩均论英雄”激励体系,将各类人才密度纳入“亩均论英雄”的用人单位评价综合改革工作。构建使命与贡献并重、物质与精神并举、激励与约束并行的科研人员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建立新型科研管理体制,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出“揭榜挂帅”式的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充分融合机制。打造更加完善的人才创新创业机制,持续优化人才“双创”服务,不断优化人才“双创”的市场环境,积极完善人才权益保障机制。推动人才区域均衡发展,协调好发达地

区在高端人才集聚区建立“人才飞地”的做法,形成人才工作生活在A地、服务于B地的引才新形态。

七、坚持营造最优人才发展生态,营造爱才、敬才的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环境是做好人才工作的社会条件。纵观全球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无一例外都拥有良好生态环境,这就要求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工作环境,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的教育环境,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和智能化的发展环境。

早在2014年10月,浙江省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人才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会上明确提出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努力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201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意见》,明确聚焦“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的目标实施人才生态优化工程。围绕“人才生态最优省”建设,浙江先后开展了“五位一体”人才生态优化工程、营造优良生态办好八件人才实事等工作。在“五位一体”人才生态优化工程建设中,浙江高度重视人才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聚力于从人才资源集聚、人才作用发挥、人才平台提升、人才政策创新和人才创业服务五方面营造良好生态。进入“十四五”时期,浙江提出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按照打造具有影响力吸引力的全球人才蓄水池目标,办好八件重点人才实事,为人才提供全过程、全方位优质服务,加快建立以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具体包括打造“线上+线下”人才服务综合体、完善人才发展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人才住房保障体系、构建具有优越的教育服务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创造无处不在的人才交往空间、营造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加大人才精神激励。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浙江正从单一集聚人才要素,转向多元创新要素集聚融合、体制机制激励创业创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空间环境促进流动增值、文化环境包容多元的整体生态打造,全方位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氛围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实践探索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是时任浙江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的一项战略部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千万工程”彻底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要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先行者”新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新使命,浙江必须继续以“千万工程”为抓手,加快绘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卷。

以产业兴旺为目标,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动力。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发展动力的来源。要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前沿,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稳定粮食生产,巩固农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推进乡村振兴不能脱离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然而,在一些乡村,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根本出路是要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和规模经济,结合实际情况,推广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稻虾轮作”“稻鱼共生”等生产模式,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吸引力。二是发展乡村旅游,集聚乡村人气。“千万工程”的实施,改变了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环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优势凸显,乡村历史和生态价值得到发掘,为发展乡村旅游业创造了条件。各地要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引导农民就近就业、就近创业,做大做优农家乐、民宿经济等新业态,多渠道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三是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三产融合”是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进行深度融合,将乡村的土地、技术、市场等要素进行优化重组和整合集成,改革传统经营模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使产业链条延伸、功能多元、范围拓展、层次提升,从而不断生成新业态、新模式、新布局的发展方式。各地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加快实现农文旅融合、农供产销贯通。

以招贤引才为重点,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而其中,以村支部书记为核心的村两委班子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为此,必须围绕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引领带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释放人才活力。

一是动员乡贤回归。要高度重视村干部的培养,把有经验、有能力、有知识、有威望的人选拔到村干部的岗位上,尤其要重视发挥乡贤的作用。乡贤往往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这些正是乡村振兴所需的宝贵资源。要积极动员和吸引乡贤回归,为农村发展服务,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二是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当下,乡村已逐渐成为干事创业的一方沃土。各地有关部门可加强大学生就业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对接,鼓励大学生尤其是乡村振兴对口专业,比如生态农业、农业机械化、农村电商等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担任大学生村官或创业,让“新农人”成为“兴农人”。三是加强农村本土人才的培养。乡村振兴和人才发展是双向奔赴的过程。在引进“新鲜血液”的同时,也要重视挖掘现有的人才资源,想方设法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如通过财政补贴或市场参与的方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动技能培训,让当地农民更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

以盘活资产为抓手,为乡村振兴提供物质基础。盘活乡村资产,既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充分梳理整合、盘活利用各类资产,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一是优化土地资源。乡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要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整合盘活农村零散闲置土地,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用地,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让乡村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二是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可探索利用闲置的旧学校、粮库、卫生院、供销社等集体产业发展物业经济,推动休闲农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加村集体收入。三是盘活农民闲置房产。要利用好乡村振兴带来的流量和人气,鼓励农民以自营、出租、联营等方式发展新业态,增加财产性收入,推动共同富裕。

以财金协同为纽带,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乡村振兴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帮扶。而金融资本要实现精准服务,离不开财政政策的引导。必须强化财政政策和金融工具的协调与配合,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相关领域。

一是加大财政贴息支持。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开展高标准农田和设施农业建设等涉农领域贷款贴息奖补试点。二是优化“三农”金融服务。强化对信贷业务以县域为主的金融机构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完善大中型银行“三农”金融服务专业化工作机制,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创新支持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重点领域信贷服务模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政府投资基金等作用,为乡村振兴营造积极的投融资环境。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着力推动数实融合向纵深发展

叶余建 刘 兵

改变,带来“卡脖子”风险和重大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存在“供需两张皮”现象,数字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行业领域发展痛点相脱节,缺少既懂数字技术又了解具体行业领域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从场景驱动看,数实融合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企业是数实融合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当前有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以政府侧推动为主,企业侧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不足,亟待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内在动力体系。其二,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但是广大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问题依然严峻,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处在单项应用深化阶段,数据和业务集成应用率还比较低。其三,数实融合在不同产业间的应用程度差异大。相较于生活服务领域数实融合的活跃,制造业领域的数实融合进展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工业互联网发展尚处于建平台多、用户覆盖少的发展阶段,成熟的应用场景较少。

从生态驱动看,数实融合治理体系仍不完善。随着数实融合深度推进,对传统治理体系、监管机制等提出较大挑战。传统治理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实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缺位”,如无法有效解决平台企业崛起所带来的市场垄断、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的伦理问题等。另一方面表现为“错位”,沿用原有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行政命令型监管方式,极易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缩减数实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以“四个转变”推动数实融合走深走实

要以“四个转变”激活数据、技术、场景、生态等数实融合内生驱动力,切实推动数实融合走深走实。

实现从单纯的数据“物理汇聚”向数据“化学反应”转变。当前,正处于从数据资源汇聚向数据要素化配置的重大变革期,这一时期,应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深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让数据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并成为数实融合的核心动能与主要抓手。其一,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在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等重点难点问题上率先探索浙江经验,夯实数据交易和运行底层制度基础,同时加大优质“浙江数商”主体培育,争创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综合试验区。其二,深入推动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创新建立公共数据授权体制机制,从供需两端发力,探索开展区域和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落地试点示范,打造一批有全国标识性的数据赋能应用场景,真正实现让数据“活起来”。

实现从数字核心技术跟跑到自立自强的转变。必须构筑起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入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区块链、数字孪生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全链条、一体化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着力开展和解决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和“卡脖子”难题,夯实数实融合硬核支撑。同时,超前布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数字前沿技术,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撑前沿技术产业化,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数实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实现从大企业面上示范向中小企业面上推广转变。新阶段,要把制造业和中小企业数实融合发展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深度赋能智造升级和中小企业数字化创新,打通数实融合的微观基础。其一,迭代升级产业大脑中心,建设产业领域的“组件商城+数据超市”,培育发展面向不同行业领域、不同企业层次的集成式、定制化、可扩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其二,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广“做样学样”“轻量化智改”等模式,面向中小企业推广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分类探索中小企业数实融合路径。其三,推动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开放合作,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开放平台、共享数字基础设施等多种形式,带头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合作网络。

实现从传统监管向包容协同的数字治理转变。建立符合数实融合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数字治理体系,是最大化释放数实融合价值的前提和保障。随着数实融合广度和深度的加速拓展,数字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等日益复杂,需加快建立完善与数实融合发展新形势、新规律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法规制度等体系,提升协同治理效能。首先,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为数实融合中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成长提供必要的发展时间与试错空间,擦亮浙江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其次,加强数字相关领域探索实践,试点推广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支持,积极培育首席信息官、首席数据官、数字工匠等高层次人才。最后,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高水平办好世界互联网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重大活动,积极参与全球数字领域技术标准、规则制定。

【作者单位分别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管理学院,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之江青年论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从场景驱动看,数实融合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企业是数实融合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当前有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以政府侧推动为主,企业侧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不足,亟待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内在动力体系。其二,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但是广大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问题依然严峻,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处在单项应用深化阶段,数据和业务集成应用率还比较低。其三,数实融合在不同产业间的应用程度差异大。相较于生活服务领域数实融合的活跃,制造业领域的数实融合进展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工业互联网发展尚处于建平台多、用户覆盖少的发展阶段,成熟的应用场景较少。

从生态驱动看,数实融合治理体系仍不完善。随着数实融合深度推进,对传统治理体系、监管机制等提出较大挑战。传统治理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实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缺位”,如无法有效解决平台企业崛起所带来的市场垄断、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的伦理问题等。另一方面表现为“错位”,沿用原有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行政命令型监管方式,极易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缩减数实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要以“四个转变”激活数据、技术、场景、生态等数实融合内生驱动力,切实推动数实融合走深走实。

实现从单纯的数据“物理汇聚”向数据“化学反应”转变。当前,正处于从数据资源汇聚向数据要素化配置的重大变革期,这一时期,应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深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让数据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并成为数实融合的核心动能与主要抓手。其一,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在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等重点难点问题上率先探索浙江经验,夯实数据交易和运行底层制度基础,同时加大优质“浙江数商”主体培育,争创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综合试验区。其二,深入推动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创新建立公共数据授权体制机制,从供需两端发力,探索开展区域和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落地试点示范,打造一批有全国标识性的数据赋能应用场景,真正实现让数据“活起来”。

实现从数字核心技术跟跑到自立自强的转变。必须构筑起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入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区块链、数字孪生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全链条、一体化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着力开展和解决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和“卡脖子”难题,夯实数实融合硬核支撑。同时,超前布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数字前沿技术,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撑前沿技术产业化,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数实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观点万花筒

加快数据要素赋能整体经济

日前,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参加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时表示,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从而推动经济全面稳定向好。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数据要素市场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江小涓认为,这将成为支撑经济全面稳定向好的新力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据生产国,不仅有全球最大量的实时数据,而且拥有较好的数据基础设施,能将生产的大量数据汇聚起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要充分挖掘数据要素拥有的功能,就要进一步理解数据要素本身具备的多场景重复应用的能力,因此可以不断挖掘出新的价值,从而发挥乘数效应。她进而提出,学术界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理论时要树立问题导向,从现实出发,避免把其他生

产要素市场的逻辑、知识体系“嫁接”到数据要素上。同时,公共部门的数据要更好地对公众开放,在做好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开放利用。

发展数字经济是发展数据要素的最终落脚点。“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江小涓建议,除了重视用数据要素赋能传统产业之外,还要高度重视一些数据原生产业,即直接把数据转化为产出的产业类型,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数据和智能产业以及应用模型的生产企业,比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二是数据计算和传输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技术相关的设备和产品;三是专业的数据生产商;四是依托数据创新产业。另外,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中要注意制度建设,数据主要采取交互方式在市场上交易流通,这就更需要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